



中国特色的民主

[德]海克·霍尔比希/文 刘建设/编译

2008-08-15

【内容摘要】由新华社提供的有关十七大的英文新闻报导中反复强调了“民主”的概念，在胡锦涛主席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可以找到60多处（准确的数字是61处）有关的论述，因而成为最常用的政治概念。此外，从英文新闻报导中得到证实，不仅是外国，也包括国内的一部分精英都对这一次党代会和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能够加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目前需要对政党政治的大事件进行分析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隐藏在通货膨胀加剧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期待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有怎样的调整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民主

引言

由新华社提供的有关十七大的英文新闻报导中反复强调了“民主”的概念，在胡锦涛主席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可以找到60多处（准确的数字是61处）有关的论述，因而成为最常用的政治概念。此外，从英文新闻报导中得到证实，不仅是外国，也包括国内的一部分精英都对这一次党代会和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能够加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目前需要对政党政治的大事件进行分析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隐藏在通货膨胀加剧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期待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有怎样的调整等问题。

国际媒体的报导像关注民主国家的总统大选或议会选举那样关注着间隔五年举行一次的党代表大会。

实际上，人们不应该期待中国政党的纲领和政治决议会反映出西方的民主形式，当然具体的计划和承诺除外。党代会报告更多的是体现了中国一党体制下的工作：1. 过去5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成就（党章中已有明确说明）；2. 在当前政治辩论的背景之前党内领导人位置和利益的平衡；3. 各级领导层谨慎的、原则上划定哪一位是上一代领导人的接班人。这是短时间内从对大会文件的分析中得出的点滴。如果将这个文件放置在一个长期的背景中，文件原文的重要意义才能显示出来。因此，与上一届党代会报告相比，最重要的是2002年（报告中“民主”概念的出现超过56次）以及过去5年间与之相关的重要政治讨论、讲话、文件与实际状况相符。在分析十七大的成果之前，首先对2002年以来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2002年以来有关政治改革的争论

2002年秋，胡锦涛接替他的前任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并强调联系群众和保持社会平衡。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党的领导从第三代平稳过渡到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新一代领导人强调制度化的集体领导方式（废除了党的领导层每年的北戴河会议）和协商决策的过程（政治局常委定期的学习会），重申树立联系群众和友好型政府的形象，关注紧迫的社会问题并准备自我限制权力。2003年春的非典危机为新领导层提供了机会，为干部体制增设了新的政治责任机制，使管理层有了更高的透明度。此外，公开承认了所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以及普遍的腐败、大量的环境污染和其他社会弊端。著名社会学家在得到党的领导的首肯后发表文章，着重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

在思想活跃的氛围中，2001年，中国共产党在为私营企业家打开大门之后，关于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在宪法中的等同性问题在保守派（左派）和自由派（右派）两种势力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2004年，关于“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的争论又掀高潮。在党内，各种党的理论刊物上刊登了无数文章，其中一部分直指“合法性危机”问题，文章指出，共产党尽管成功地领导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伴随而来的还有社会的不平等、腐败和革命性的丧失。中国共产党自己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失败、中国国家的未来与命运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都有赖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并以此能力来解决那些急迫的问题。官方很快作出了回答，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点的核

心是基于协调社会矛盾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要求。国家领导人也像证明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一样，在实施“科学”引导社会经济过程的协调性方面显示其实际能力。

同时，在精英内部，一部分对官方说法不以为然的人也在为继续进行政治改革的问题而展开争论。党的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为克服合法性危机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些建议包括自由民主主义的竞争要素、机构的平衡和控制、党内民主的法制监督机制以及回归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2007年春以来，持续不断的争论愈演愈烈，自由主义的党内老前辈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介绍给中国共产党并招致了党内保守派的严厉批判。这些观点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中国共产党为“资本家”打开大门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并使党面临危险。如果不是及时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中国也将面临前苏联的命运。2007年夏秋之际，出现了很多诸如党政分开、扩大民主竞争选举、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实现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多元化等自由言论。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超过1.2万人联名给党中央的公开信引起轰动。信中要求保证基本的民主和公民的自主权并开始实行真正的政治和法治国家的改革。

许多观察家希望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这些有争议的辩论中得到加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清晰信号。如果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第一个任期内稳重的改革总体上令人失望的话，那么在他政治权力进一步巩固的第二个任期内，这样的希望似乎更加无可非议了。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2004年初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不仅被胡锦涛在报告中数次提及，而且明文确立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实际情况是，在5年任期之后，这一理论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系列之后也成为官方理论的准则，明显打上了胡锦涛个人的印迹，成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巩固的明确标记。

这两个新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平衡社会的政策和可持续的、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党的领导人的既定目标，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和谐社会”的内涵是，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之后又新增加了第四项“社会建设”，这是党为积极推进主要任务而对政策所进行的修改。在党的发展报告中有一段独特的、新加入的有关改善民生的章节。它提出的措施是：改善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以及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计划也像其他需要加强的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措施一样，证实了党的领导在转变观念方面的政治意志。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当大规模的为这些措施提供资金时才能证明一切。

最引人注目的是，党的报告中具体的经济目标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想法存在矛盾。中共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两倍，并修订了更高的目标（到2050年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三步战略目标”）。不仅是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增长，而且人均GDP也同期增长（从2000年人均GDP850美元增长至人均3500美元）。这些——预计人口增长加快——宏伟的目标修正首先被一些国际观察家所忽略，而国内媒体则完全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说法，在他的研究中心进行了修正目标的研究。研究显示，鉴于过去经济增长情况，宏伟目标的未来增长率将适当地低于7.5%。即使从统计的角度来看达到这一目标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官方相关的提高定量增长目标的信息与持续的、环保的发展是相违背的。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更值得怀疑，近年来，中国引入了“绿色GDP”的提法，从经济学方面估算经济发展的生态花费，并在国民生产总值常规计算中适当向下作一些修正。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资格的意识形态辩解

除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讨论作为持续发展的一种政治实践和平衡社会的政策不应该被忽略之外，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巨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科学发展观”包含了它所强调的“统一规划”，暗含着国家领导人从政治统治的需要出发，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认识加以“科学的”引导。正如一位保守的党内元老富有哲理地指出：在我看来，科学发展观意味着国家以有计划的、均衡的、协调的方式发展经济，换句话说，就是计划经济。

“和谐”的概念也就是党章中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解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除了承认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作为最高领导机关的一部分活跃的国家领导人同样需要“和谐”。因而，随之出现了中共领导人敏锐的意识形态的辩解，强调协调的社会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以及“以人为本”。

如果人们近距离地仔细观察这两种概念的意识形态框架，合法性就变得更为清楚了。2002年的上届党代会报告已经高高举起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十七大报告又将此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报告在显要位置阐述了在邓小平改革政策指引下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正确和历史意义，并且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是继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章中也新增加了相应的段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继续发展的国情的。关于党的领导所进行的不断的理论创新是目前经济改革成果的基础，也是对未来发展的保证。这种理论的立论将使得中共领导人不仅凭借理论创新重新确立了以往的合法性，而且也确立了未来的合法性。

根据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的回归进行意识形态的自我检查可以推测，所谓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共领导人资格起到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作用。党内一部分左倾“元老”认为低估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意义，迫于他们的压力，党的报告突出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一部分党内精英几年前就已经看出，党的领导在努力使共产党的一党执政重新合法地置于经济现代化的光环之

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

十七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章节中特别提出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显然，这个要求使其具有了相对性。报告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篇幅与5年前的报告相比减少了四分之一，政治改革的方面也从九项缩减为六项。回顾2002年，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的是“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十七大报告显示，“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从几个方面谈一下：

1. 扩大人民民主。在扩大人民的参与权、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制度以及地方自治等方面的用词十分含混。一些具体的新方法是出于地方人大农村代表的要求。2002年的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该“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而十七大报告则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应该“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这两种说法有多少差异，从理论本身很难判断，但是有特色的措辞有可能使党政政治冲跨人大的堤坝。至少这种新的提法接近于机构的现实，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中的定位只是形式上的，虽然表面上尊重人民的权力，实际上人大议事日程全由共产党掌控。此外，协商民主的思想也被提及，问题是，直接涉及普遍关注的利益和民意已经被包括在立法和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并在过去几年里得以反复实践。

2. 在基层党政干部领导下完善城乡社区自我管理的情况下发展基层民主。扩大城乡社区自治范围，其中具体的做法可以理解为进一步扩大社区民主选举的实验，同时，像协会、社团等社会组织在社会自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3.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国家机制。特别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提法出自2004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

4. 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在这里，一个新的、积极的内容是宗教领域被涵盖在统一战线的理念中，并提出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正面作用。在它背后隐藏的是宗教政策的重新定位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

5.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报告中提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特别是无数的经济行业协会与其他非经济组织的区别可能还需要再评估）。然而，曾经在1980年就被明确提出的党政分开却没有再被提及。国家管理部门继续精简重叠和职责范围交叉的部门以及减少干部数量的预期目标变得很遥远。2008年3月的11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宣布继续采取精简的措施，而去年身兼数职的干部占据主要党政机关位置的趋势似乎不断增长。

6. 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里提出的“在阳光下”行使政治权力这种含混的词语是出于加强预防监督措施和功能机制制度化的需求，为了在党和政府机构中与不断蔓延的腐败行为作斗争。

总体来讲，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很含糊、很空洞，民主概念还不够具体化。实质上，2005年秋的政治民主白皮书已经划定在构想的框架之内。在这里，民主的核心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党内民主

可以看得见的有关民主概念利用的基本方式按照传统呈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的最后一章，也就是关于“党的建设”一章。从一开始提出党的自身思想建设，到报告中再一次提出理论创新的伟大意义，都是为了通过建设“学习型”政党，维护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机构的执政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出实现“党内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先决条件：“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十分明显，这种提法按照列宁主义的理解，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角色在改革进程中依然是“先锋队”和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民主化在这里并不能理解为其本身的意义，而是作为增加党的统治的效率和合法性的纯粹功利主义的手段。党内民主的目标是通过更加透明的党内协商过程推行讨论决定重大政治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以及通过扩大基层党组织有党员参与的竞选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个人责任意识。

党的报告和作出相应修改的党章提出了在党内民主框架内实施以下具体措施：

1. 增加党对重大问题决策的透明度，改善党内“民主讨论”的环境。
2. 加强各级党委在两届党代会之间的工作。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或者说是地方党委成员要完成上一级党委交付的工作任务，他们可以通过新的“任用”制度被授权，在任期内参与人事政策及其相关事务的讨论。在选择一些区县作小规模试验时进行相应的改革尝试。
3. 加强地方党委及其常务委员会在重大问题决策中的作用，并引入新的人事及其相关问题的表决程序。
4. 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5. 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应该通过“民主”提名和选举方式改进迄今为止的人事决定制度。领导位置的确定不再只由上级党组织单独决定，还要根据各地基层组织的“民主推荐”。目前正在一些地区进行的党内领导职位直接选举的试验应该继续扩大范围。
6. 反腐败斗争将引入中央和省级监察机构定期检查制度。

与报告中关于扩大“人民民主”的很模糊的措辞相比，关于体制改革的具体的政治改革意志是可以看到的。尤其是上面提到的在一些地方将已经确定的改革模式进行试验的意图对于继续加快国家层面的改革步伐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中共新领导层：党内民主的产物？

不仅党代会报告把“党内民主”放在显要位置，中共新一代领导集团也一再强调民主化的工作程序。官方媒体不厌其烦地强调，党代会代表的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选举以及新一届政治局委员的选举在预备会和十七大会议期间都是在民主提名和民主选举程序的基础上进行的。与2002年的党代会相比，竞争的要害明显增长。

2007年8月公布的2217名十七大代表，差额选举名额的比例超过15%。如果竞争者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他赢得未来最重要的成功将是，当选为无上荣耀的代表参加党代会并将在接下来的5年内参与决策的协商过程。更具有政治意义的是选举至高无上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讨论。2002年以后，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数量高于实际人数的5%，因此，具有改革精神的十七大代表希望，差额的比例能够提高到10%至15%。实际上

的差额比例是8.3%，相对于2002年略有提高。然而，官方媒体的报道则着重强调了自2006年10月以来全国范围内党代表候选人提名由党组织任命变为“民主推荐”。同时，与204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的排列顺序不同，167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的排列顺序不是按照姓氏笔画，而是以选票结果排序。这样的列表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候选人在党内的声望如何。

展望

对来自官方的党代会文献的分析来看，对中国政治体制继续民主化的期望依然令人失望。虽然报告明确提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党内民主”的目的很清楚是在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中，民主是通过法律保障和制度化的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及公民的民主参与来限制国家权力，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的。以往的党代会报告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党的领导人很少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行事。相反，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化的”民主概念，也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明确概述。提出的很多政策都是为了加强机构的效益、强化党内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其趋势与其说是削弱权威结构倒不如说是巩固权威结构。

中国“弹性的权威主义”呈现出的强大力量似乎使党内一部分精英意识到合法性存在危机。自2004年以来，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社会经济增长的差别、无法控制的腐败以及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成为日益加剧的难题。引人注目的是去年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变为己有（中国化）满足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的需求。同时，中共领导人完全合理地凭借理论创新平衡了社会经济矛盾、调和了社会利益冲突。

为了继续维护其合法性，中共试图以传统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或者说是作为一种保证。正如大会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借用构建民族的认同来为其服务。特别是报告中讲到的例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以及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样的话语，在党章中也可以找到。然而，党章悄然删除了与其他国家经济和技术交流以及利用世界“文明成果”的字眼，让人感到，他们未来将更加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这个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国家不仅是经济大国，而且也是政治大国和文明大国，它将在西方民主模式之上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中共高层领导似乎热切期盼创建一种自己的政治价值和民族认同组成的关系框架，它代表了一种西方民主标准的重力中心选择。当前关于“重返权威大国”的政治学讨论能够激发起中国新的自信心。

资料来源：Heike Holbig: Demokratie chinesischer Pr?fung – Der XVII.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China aktuell, 6/2007

（来源：《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7期）（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

上一条
下一条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想史梳理
“创新型经济”、“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公平”——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